

回忆小平同志在渝工作二、三事

张文澄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9年11月我响应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号召,从武汉市报名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便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西南服务团进军重庆,当年12月4日到达重庆,与组织部长魏思文等同志住在大溪别墅《潜园》(现市卫生局所在地)。同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1950年5月调任中共重庆第三区(现沙坪坝区)区委书记至1953年5月。在此期间,多次目睹小平同志的英姿,多次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受益良多。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在进军途中,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湘西常德宣布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西南一级机关进驻重庆市,立即着手政权建设。大约两、三日后,小平同志提出重庆是大工业城市,人口多、工业多、情况复杂,城市工作量大,建议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分开。川东区党委机关,原拟设在枇杷山《王园》,分开后去了南岸黄桷桠;重庆市委机关则从大溪别墅《潜园》,(因《潜园》太小,不够使用)搬进《王园》。此事被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知道后,向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和第二书记张霖之同志说:“枇杷山最好开辟为公园,目前市委可暂住那里,反正要开辟成公园就是了。张霖之同志立即向市委全体成员传达了邓政委的这一指示,1959年冬,西南一级机关撤销后,市委迁中山四路,便

按照小平同志的原指示,将《王园》所属的枇杷山,建立成《枇杷山公园》,将部分办公用房分别拨给《市博物馆》和《市图书馆》。

关心地下党同志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进军干部与地下党同志举行会师会。会场在曙楼(原国民党市政府所在地,现儿科医院住院部)我担任会议司仪。会议开始前,小平同志来到休息室,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于江震同志汇报第一任重庆市委委员组成情况,并把名单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仔细看过名单后问:“名单中有无原地下党的同志”?于回答:“其中的张文澄是原四川地下党的。”小平同志点头认可。说:“好、好,不要忘了地下党的同志。”会议开始后,邓小平同志代表西南局宣布了市委委员名单,他们是: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段君毅、万里、罗士高、王近山、刘明辉、李震、康乃尔、张文澄。并勉励大家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刘伯承、张际春(西南局副书记兼重庆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关心上层统战对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51年秋天,我受市委委派前往巴县,协助巴县县委搞农村土改工作。在一个月协助土改工作中,亲身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对上层统战人士的关心和党的统战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当时西南地区有许多上层统战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吸收了刘文辉、但懋辛、熊克武、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分别担任副主席、委员等职务。农村土改工作开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西南统战部安排这批统战人士到巴县参观土改。这批人士住在南泉,凡是县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每次都请他们列席,还组织他们下乡参加土改活动。这对他们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记得一天晚上县委在南泉公园召开土改小结会,我结合党的土改政策作工作小结。大约讲了三个小

时,刘文辉等统战人士都认真作记录。

据曹狄秋市长事后告诉我,刘文辉在向西南局统战部汇报时说参加土改,思想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听了张文澄的讲话,对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深的了解。曹市长还问我“你对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臭骂了他们一顿”。实际上是我将青少年时知道的四川军阀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夺的惨情,结合小平同志对新区提出的土改政策,讲了土改的必要性和对各个阶层的具体政策,其中包含了统战政策讲事实、讲道理、说得他们口服心服,完成了市委交给我的任务。

关心城市民主改革政策

1951年上半,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开始起步。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于是便组织力量深入磁器口、小龙坎等街道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城市的民主改革情况复杂,人员成份难以确定,不能简单的照搬农村土改的那套。如商人就包括资本家、小企业主、小商小贩等等。民主改革对象不明确,政策吃不准。我们又认真学习西南局和市委有关文件,提出城市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如开业医生),不算民主改革对象,而应类似农村的中农作为团结对象的设想,用三区区委名义,给重庆市委写报告,市委又把报告上报西南局,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同意”。并建议加上西南局批语,在《西南工作》上全文刊发,指导了整个城市民主改革工作。

举家入京

1952年7月,因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小平同志入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接中央通知后,不讲任何条件,毫不拖泥带水,很快安排好西南局工作,立即举家北上。由于去得快,以致到北京后,中央有关部门尚未为小平同志及其家属准备好住房,他们全家

只好住在招待所内。事后听市委书记张霖之和曹获秋市长讲,毛泽东主席对小平同志此举十分赞赏,大加表扬,认为他干脆果断,不讲价钱。由此可见,后来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人才难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而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时,在我心中树立了如何作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同时,也更增添了对小平同志的敬仰之情。1953年5月,当市委决定把我从三区调到市委宣传部时,也以小平同志为榜样,不讲价钱,愉快听从党安排,未带一人一物离开了辛勤工作三年之久的三区。小平同志“举家北上”的史实,对后人特别是当代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形成讲原则、守纪律、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大有裨益。

根据张文澄口述
何莉、孙俊整理

启蒙一课 受用终身

——深切怀念邓小平政委

孙道存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党中央“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下、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进步知识青年数万人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我当时正在上海大学读书,自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学校走进军营,有幸聆听了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老实”,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水平最高、极富哲理,论述精辟、意义深远的一课,也是我步入人生旅途时启蒙一课,嵌入脑际,永世难忘。

西南服务团进军目标是云、贵、川,在“西南八千万人民需要你”口号鼓舞下,近一万八千名年青的知识分子投入这座革命熔炉,我和当时同学,都是幼稚的青年,盼望祖国富强,急于投身革命,向往光明幸福;但对革命真谛并不知晓,想的是革命定会一帆风顺,至于革命征程中艰难险阻,更是没有精神准备,我们呈递给二野司令部的“申请书”“论战书”上,充满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饱含激情的辞语,第二野战军首长们充分肯定并赞扬了我们的爱国热情,从老区抽调三千干部带队,针对这批有决心、有信心,但毫无实践经历的学生大军,由军机繁忙,戎马倥偬的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来讲这场政治报告。“淮海战役”刘邓大军威震神州,“百万雄狮渡大江”后,刘伯承、邓小平的英名更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我们刚入军营的新战士,多么想瞻仰刘、邓首长风采,1949年8月,在原国民党国民大会堂,司令员刘伯承主持大会,邓小平同志身着一身洗旧了的军装,脚穿布鞋,用道地的四

川口音，宏亮又恢谐的语气，一直讲了几个钟头，这样战功赫赫、驰骋疆场多年，功高位显的高级将领，真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有那么高深的理论水平，讲话又那么慈祥生动，亲切、感人至深。听课时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激动处，经久不息的掌声。

邓政委的报告开宗明义，他首先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全面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涵义，他说：“革命队伍里，最讲究老实”，他告诫我们：“讲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他在肯定了我们革命激情同时，谆谆教导我们：“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只能算有了革命愿望和热情，到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还需要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的锤炼和考验”。他着重讲了“过关”问题，邓政委说：“古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知识青年参军，也要‘过关斩将’，可以说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三个大关是要过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至于具体小关么，那就无数了，象‘生死关’、‘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等等”。继后，他着重地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怎样过好“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

我们在南京集中学习了邓政委的报告，经过反复深入讨论，这是我们投身革命后最好的一堂“启蒙课”。中央下达了“进军大西南”军令后，我们跟随第二野战军挥师南下，挺进大西南，被誉为“小长征”的铁流七千里开始了。从6月参军到解放重庆近半年征程中首先最难的“家庭关”过来了，当时祖国半壁河山尚未解放，福建、两广、西南与西北仍属蒋管区，大局未定，此一远征生死难卜，许多家长阻挠子女参军远走，而我们战士改名换姓者有之，深夜私奔者有之，有的战士拒绝了父兄为其在台湾、港、澳备好的房产和巨额存款，终于踏上了走向大西南征途，有的出身于官宦富商家庭，毅然投奔革命，如傅作义将军之女傅冬菊、国民党教育部长梅贻琦之女梅祖成、朱家骅之堂兄朱家骝，更多战士纷纷斩断绵绵儿女情，赤诚一片奔军营，这就是“过关斩将”精神；在过好“生活关”

中,抛弃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和富饶江南城市的优越生活,走向“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走向“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以及古代贬之为“充军”之地云南,这种被邓政委报告中提到的“大米反饥饿,小米扭秧歌”的反差,正是“过关斩将”精神驱使;在过好“走路关”上,从进军开始徒步 20 华里,到 40、60、80 华里,入川之后为了早日“解倒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早日解放重庆,更是日夜兼程,在武隆、酉阳翻越白马山,最高行军速度达到日夜 130 里,走向大西南的“七千里路云和月”中,战士平均穿破了 5-6 双军用胶鞋,“练出一双铁脚板,昂首阔步进重庆”,这真是“过关斩将”的威力。我们西南服务团第一分团在曹荻秋同志率领下,接管重庆。参加重庆建立民主政权工作,邓政委“论老实”的“启蒙课”,在我们思想上奠定了原动力,注入了持久强劲的活力,增添了进军西南征途中的战斗力,也成为我们紧跟着党终身革命的免疫力。

四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广大的西南服务团战士,遍布西南云、贵、川及西藏高原,进军大西南,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血洒大西南,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开拓大西南,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扎根大西南,奉献了毕生精力;闪光大西南,在各自岗位上,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过好了“权力关”、“金钱关”、“酒色关”、“人情关”,始终忠诚于人民,大家没辜负邓政委当年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噙着悲痛热泪默默念着:再也听不到邓政委那高亢、果断的声音了。我们手捧着《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湛理论,是您走完光辉一生旅程后传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改革开放春潮汹涌澎湃,华夏大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中华腾飞指日可待,亿万炎黄子孙一定会实现您老生前遗愿。

和小平同志同乘小火车

陈建初

1951年,重庆解放才一年多,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在重庆举办一次西南工业展览会。目的是检阅西南地区的工业生产力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鼓动全西南人民为建设新西南而共同努力。地点定在大田湾。当时,我们一群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被调入筹备处,我被分配在保卫组工作。

当时,大田湾还是一大片荒地,办公室、展览室和工作人员的宿舍都用楠竹、蔑席捆绑而成。来参加展出的公私厂矿企业有750多家,分成铁路、钢铁、机械、轻工、化工、纺织、矿业、电业8个馆,展品主要是图表、模型和部分实物。那时,最牵动人心的是铁路馆。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就决定立即动工修建成渝铁路。尽管当时财力、物力都十分困难,还是预定1951年9月1日从重庆通车到永川,为普及铁路常识,铁路馆在大田湾临时修了一条绕场一周的轻便铁路,将天府煤矿矿用小火车头和车厢调来,供人们参观和乘坐。

小平同志对展览会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关注,并应筹备处之约,为展览会题了词。原文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题词于1951年8月10日展览会正式开幕那天,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上。

展览会开幕前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三点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小平同志来了,我们纷纷赶到展览会大门口(现跳伞塔旁),只见邓小平同志在十多位同志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

满脸含笑进场来了。

在此之前,我只有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中,听到过小平同志的英名,而这天,我们却有幸在如此近的距离内亲眼看到了他。他身体健康,精力异常充沛。那时,小平同志才47岁。

那天,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逐馆观看,最后来到铁路馆,听罢介绍,迳直登上小火车。这时,我们一大群工作人员也跟着上了后面几节车厢。由于火车是绕着圆圈行驶,车速不快,我们清楚地看到:小平同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面指点着窗外的景物,一面讲述着什么……列车绕场一周,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但我们都无比的兴奋,都以同小平同志乘一列火车而感到万分荣幸,分外骄傲。

展览会原订展出50天,后应观众要求,延长到10月10日结束,两个月时间,接待了西南各地的观众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共72万多人。

46年过去了,西南的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单是铁路,就陆续建成了成渝、宝成、川黔、贵昆、成昆和湘黔、襄渝等7条干线,直通沿海的南昆线也已铺通。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小平同志的心血,都是同他“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忆小平同志对工商界人士的关心和教导

吴昭辉

邓小平在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对重庆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十分关心,曾召见工商界代表人物胡子昂、温少鹤、肖松立等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为重庆工商周刊题词。

刚解放时,我和大家一样,由于不了解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终日惶惶不安,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情绪低落,等待观望。这时市商会及时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小平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爱护和保护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要爱国守法,积极经营踊跃纳税。他对工商界提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讲话在工商界传开后,个个拥护,人人精神振奋。我在民族路经营的祥生文具社,规模不算大,但在同行业中,信誉很好,业务也做得火红,听了传达,吊桶也没有了。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积极经营,踊跃纳税,带动行业几次大的集体纳税、集体入库,被推选为重庆税务协进会主任,得到政府授予协税模范奖旗和奖状。

邓小平在重庆也曾召见老宝元通股份有限公司黄凉廛,肖则可,肖雨生,王进云等负责人,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掌握命运,鼓励他们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几位回到公司后,召开了董事会,带头响应号召,自愿把宝元通带头转入国营,成立了西南百货公司,即现在重庆百货站前身。重庆工商业,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与当时邓小平的教导,解除我们思想顾虑分不开的。

(张凤林整理)

贺龙、邓小平同志创办八一小学

郭翠芳、尹志厚

1952年,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西南军区政委)为西南军区创办了干部子弟校八一小学。贺龙、邓小平同志亲自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校政训大队、炮兵学校、军区战斗文工团抽调大批干部、人员组建学校。并将西南军区新闻处,战斗文工团驻地作为校址,派人到北京考察北京第十一小学等学校的建设。第一期拨款70亿人民币(旧币)修建校舍并亲自任命第一任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这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浮图关职业中学(重庆一一四中学)的前身。

学校位于渝中区风景胜地浮图关公园的至高点上,西北紧邻电视台,东南紧靠革命先烈杨闇公烈士英勇就义的纪念地,占地44.3亩,建筑面积14027平方米,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革命前辈选就的读书胜地。

学校建立后,邓小平同志曾托邓垦同志多次到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贺龙同志也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学校开办以来为党和国家、人民军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栋梁之才。

学校于1965年底划归地方管理,三十多年来,几经变迁,目前已成为初中与职高兼有的学校。根据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渝中区教委已将学校规划为具有国家级水平和规模的职业教育中心,并于今年开始逐步实施。

八一保育院院史简介

袁振翔、代素芬

座落在重庆市大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保育院，是建国后我军最早兴办的幼儿园之一，是敬爱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幼儿园。

八一保育院原名西南军区托儿所，于一九五零年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共同组建。原址在上清寺原国民党行政院内。

筹建小组的组长是西南局秘书长刘亚桥同志，副组长是西南军区政治部团职秘书袁振翔同志。组员是：薛明（贺龙同志夫人），王荣华（刘伯承同志夫人），卓琳（邓小平同志夫人），罗平（张际春同志夫人）。筹建时间半年左右，于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正式招收托儿儿童。招收的对象是西南军区团职以上的干部子女。

首任所长由袁振翔同志担任，副所长由鲍侃（原延安保育院工作人员）、罗平同志担任。

托儿所下设两个股，保教股和总务股。保教股股长由王天竹同志担任（陈鹤桥同志夫人），总务股长由宋在舟同志担任。下设保教干事，管理员、会计、出纳、卫生所长、医生、护士、司药、化验员、营养员、警卫班、护理班、洗衣班、缝衣班、炊事班、工作人员120人。人员的组成来自解放军后勤学校、护士学校、炮校的女兵和西南军区的干部。

托儿所为寄宿制，编有六个班，招收儿童一百余名，全部实行部队供给制。

西南军区的首长们非常关心托儿所的发展和建设。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经常来托儿所指导工作，看望孩子们，关心

儿童的成长,还与孩子们一起联欢照像。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的关怀下,托儿所重新修建于大坪单巷子内,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是一所具有四合院式,平房结构特点,配套齐全的标准幼儿园,这种建筑风格保留至今。

园舍建成后,贺龙同志亲自为幼儿园题名为“西南军区八一保育院”,一九五八年与西南军区后勤第一幼儿园合并为“八一保育院”。

八一保育院从创建到今已走过了四十七年的历史,前后历任了袁振翔、陶锋、康瑞、刁乃俊、刘振海、苏明、孟昇、程丙月、邹守允、程琼玖、代素芬十二位院长。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招收儿童由六个班增加到十二个班,幼儿人数达三百多人。八十年代招收8个班,幼儿人数二百多人。现设6个班,招幼儿人数二百人左右。

四十多年来,八一保育院在部队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加强幼儿园的科学管理,积极改善办园条件,坚持保教并重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幼教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军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曾多次获得了四川省、重庆市、成都军区,总后勤部“先进集体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八一保育院认真贯彻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积极参加幼教改革,抓住机遇,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优质的服务态度,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水平,优美的教育环境,优良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地为部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儿童服务。在幼教行业中创造出了新的业绩。如今的八一保育院已发展为园舍、场地、保教设施、设备齐全,教玩具充足,环境优美的重庆市一级幼儿园。

老师关怀 殷切期望

——记学校的初创和刘邓首长对学校的教导

穰明德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军胜利地进行了邯郸战役。晋冀鲁豫区党政军机关就迁到邯郸。祥云初开,一度出现了和平气氛。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党政军干部集中邯郸,他们的家眷也来了,学龄前儿童有近百人。这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急需入学。邯郸虽是古城重镇,但累遭兵火,学校所剩不多,当地儿童入学都感困难。

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我们不能同地方争校舍。我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根据延安时期的办学经验,我计划办一所子弟学校,并把拟定的具体方案,向刘帅作了汇报。刘司令员日理万机,正和邓小平政委一起谋略中国的前途。然而他听了我的设想后非常重视,说道:“好嘛!你很有战略眼光嘛!现在是应该考虑办学校了。”刘司令员略停片刻后,又说:“我们要为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人才,他们必须有文化、有道德、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创造精神和铁的纪律。这个办学宗旨一定要明确,千万不能培养特殊阶层和‘娇骄儿’。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主席把毛岸英送到莫斯科学习,回来后又让他参加生产劳动,跟普通人一样。又有知识,又能劳动。我们就要培养这样的人。”我连连点头。

“延安那件事你还记得吗?可不能再发生了。”刘司令又问道。这件事我还记得的,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有病长期住院,没有时间管教孩子,于是这孩子在延安城内胡作非为,买东西不给钱,还说:“我是某人的儿子,要钱找他去好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记得,我们一定记取这个教训”我认真地回答。

接着刘帅又说道：“教育儿童，恐怕还要让教师学点教育学。我在苏联看过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父母必读》，这是很好的两本书。马卡连柯就是主张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这两本书让教师读一下有好处。总之，争取把学校办好。我们的孩子都交给学校管教。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教育他们，主要靠学校啦。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职务，避免他们产生优越感。‘苟不敢，生乃迁’、‘教不严，师之惰’呀，到时候我可找你们学校负责哦？”

几天后，刘邓首长千方百计给学校拨了简陋的校舍和设备。这在当时很难得到的，足见刘、邓首长对教育、对儿童的重视和关心。开学后，学生全部寄读。这是有意培养他们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集体观念。只有星期六，才让孩子们回家去过周末。有的干部家离学校较远，都是步行或自己花钱租一辆人力车去接孩子，从没有人搞特殊化。刘帅更是以身作则，他爱人汪荣华也总是星期六才把自己的孩子“小太行”接回家，没有一次违反过学校制度。

不久，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包围了延安，占领了张家口。战云密布，刘、邓首长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挥戈南征，开辟新区。在离开邯郸前夕一次军事会议的间隙，刘司令员找到我说：“穰明德，我想起了一件事。培养儿童恐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培养他们的骨气和荣辱观。你记得不？三国时，刘备的儿子阿斗，就因为从小没有很好的在这方面启蒙施教，所以后来成了傀儡皇帝。结果被司马懿俘虏，还恬不知耻。刘备旧部曾准备里应外合搭救他，以便东山再起。可他却说这里生活很舒适，你们不必多此一举，搞不好倒丢了我的性命。你看这阿斗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我们不能培养阿斗这样的人呀！这个故事一定要让教师给孩子们讲一讲。”刘司令员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我听了深受感动。他在军务繁忙之中，仍站在历史和革命的高度关心儿童，是多么令人钦佩啊！

后来,这所子弟学校在战火的洗礼中不断发展扩大,在西南解放后,该校迁到重庆,正式定名为西南人民小学,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同志亲任校长。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刘邓首长日理万机。但刘伯承同志在百忙之中仍然抽空去西南人民小学视察,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学好真本领。在一次大区省军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刘帅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我们现在进城了,广大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防止发生李自成的悲剧,最后落个前功尽弃,毁革命成果于一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教育好后代。我们的孩子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进城后切记不要对他们过分溺爱,如果在舒适的环境中变成纨绔子弟,将来就不能接好父辈的班。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受到损失。”

在这以后,刘帅又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找来,专门对我们讲:“给孩子们讲关公的故事,既要讲关公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讲关公最后走麦城、被斩首的悲剧。现在人们胜利了,孩子们很高兴,以为我们只是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好象我们革命成功都是从胜利中过来的。其实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失败,把革命的艰巨性告诉孩子,特别要告诫孩子不能学关公的骄傲自满。如果象关公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会落得走麦城的悲剧。”

在刘帅的亲切关怀下,西南人民小学为祖国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注:穰明德同志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长征老干部,他长期在刘伯承同志身边工作。曾任红二方面军总直政治部主任,抗大党务委员会副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西南交通部副部长,国家公路总局负责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十年风雨创业艰,人才辈出兴校园

窦怀理

1949年学校从河北邯郸迁至重庆后,为了解决来自去解放区及南下干部(科处级以上)子女就学问题,1950年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西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夫人苏冬决定联合筹办西南局一级机关干部子弟学校。

筹办初期,人力、物力、财力极为困难,暂借西南局大院(现市委大院办公厅所在地)简陋平房作为教学用房,学生所用的课桌凳是国民党军子弟学校留下的,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班,卓琳任校长、苏冬任政治协理员,黄裳、李仆任教员,外加一个工人,这就是当时的办学规模,卓琳请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为学校命名,刘伯承题为人民小学,之后,卓琳、苏冬向西南局要求增加行政管理干部,西南局先派了窦怀理等三人分别担任学校总务科科长、会计及管理干部,紧接着,成立了校董会,贺龙任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刘仰峤(西南局秘书长)于江震(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刘岱峰(西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钱信忠(西南卫生部部长)陈鹤桥(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廖苏华(西南妇联主任)。

由于西南局要在当时学校所在地修建办公厅,学校被迫另选校址,在西南局领导的指示,校董会及重庆市地政局的努力下,租借了私立教会学校(现六中所在地)的校舍,决定再扩大办学规模,加收西南军区的干部子女共预计300人左右,开设1-5年级,1950年10月迁校并改名为西南军区直属人民小学。接收了重庆交通银行子弟学校留下的办学设备,风琴是由当时空军子弟校捐助,万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部长)向军工厂要了一个炮弹壳作为上下课的课铃。学校的教职工队伍进一步扩大,聘请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为校务委员。叶虹为教导